

试论阿以战争中的大国干预

周士新

摘 要：大国干预地区事务体现在大国之间的横向互动以及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纵向互动。大国干预具有制衡性、非对称性及强制性等特征，体现了大国干预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在叙述大国干预阿以战争的基础上，发现安全利益、威胁认知、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着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动机。当前巴以冲突中大国干预的影响依旧存在，且对阿以和平以及中东安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以战争；大国干预；强制；安全利益；威胁认知

作者简介：周士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05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4 - 0053 - 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安全利益、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了阿以冲突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现代中东战争多是阿以冲突升级的结果，阿以之间的小规模摩擦更是不胜枚举。历次阿以战争的爆发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大国干预阿以战争。大国试图按照自己解决问题的理念和方式，对阿以冲突双方或提供支持或进行威胁，以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本文正是以大国干预为切入点，强调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现象，并以历次阿以战争为实际案例，分析大国干预对阿以战争的影响，^[1]籍此发现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国干预及其限度

国际体系结构主要以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为特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主导着国际关系发展的途径和趋向。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已成为一种常态，均势、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国际关系理论都说明了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作用。而这些理论的提出也为大国优越论及大国干预地区事务提供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就体现了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国家主权原则为消除一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提供了国际法保障，但在地区事务中，大国干预行为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规范之外。一方面，只有国际性大国才具有能力和意愿介入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冲突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也需要外部力量给予斡旋或仲裁，这也为大国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机会、可能和基础。

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对盟友的外交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甚至在必要时直接

加入盟友一方，争取胜利；对敌对方的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封锁和打击。当然，大国为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升级从而危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可能通过威慑来达到自己所需要的战略态势。

大国干预地区乃至全球事务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制衡性。它强调大国为何和如何影响与塑造均势以及这种均势态势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国际冲突的。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均体现了均势理论，而这些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国主导着体系内的国际事务。这些体系不仅呈现出行为体集团内部的集体安全机制，也体现了集团之间的集体对峙特点。为维持均势和取得优势，大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结盟的形式壮大自身的力量，增强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地区冲突中，大国干预的均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区内大国与小国结盟，影响地区事务的发展；第二，地区内小国与地区外大国结盟，影响地区内事务的发展；第三，地区外大国通过寻求地区内均势或者优势，实现在整个国际体系内的均势和优势。

其次，非对称性。这表现在干预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性以及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结盟后相互之间的非对称性上。这种非对称性不仅体现着双方力量的变化，也体现着大国干预地区事务以及地区国家甘愿接受大国干预的政治意愿的变化。冷战期间，干预大国主要采取了代理人的形式干预中东事务，阿以战争参与各方代表着干预大国之间的利益需要，也反映了干预大国与代理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及双方在平等性、成本—收益以及相互制约等方面的关系。总体上说，代理人的利益通常局限在地区层面上，而干预大国往往从全球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地区安全政策。因此，地区国家的利益需求绝不能超越干预大国在地区内的安全考虑，地区内冲突也将随着干预大国全球安全利益的需要而张弛有度，但由于干预大国对地区安全的需要不会消失，地区冲突亦难平息。尽管干预大国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代理人的利益似乎始终受制于干预大国，但也存在着干预大国被代理人套牢而陷入地区冲突且难以脱身的情况。

最后，强制性。这表现在干预大国之间的强制关系、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强制关系、干预大国及其代理国和另一干预大国及其代理国之间的强制关系。强制的胁迫性与威慑性要求对手按照干预大国的利益需要采取行动或按兵不动。由于强制作用的相互性较强，干预大国通过强制行为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行为。^{[2] 173-217} 冷战时期的阿以战争既表现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强制作用，更表现了干预大国之间的相互强制作用。为避免地区战争升级为全球战争，干预大国或操控代理人的行为，或威胁对手的代理国家，以缓和甚至平息地区冲突，为全球安全利益服务。由于始终存在冲突各方的强制性力量，甚至各方均认为对方的强制性力量始终存在，中东冲突或中东战争的隐忧始终存在。在大国干预下，这种隐忧往往被扩大，相互之间的强制关系陷入无限循环当中。

大国干预的效果需要在战争中得到验证，战场是衡量战争各方诉诸战争力量及政治意志的“试金石”。干预大国或积极支持自己的代理国击败对手，或抛弃自己的代理国，或直接威慑对手，或寻求外交渠道。在历次阿以战争中，大国干预对战争进程及结果均发挥了极大作用，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历次阿以战争中的大国干预

以色列建国伊始，阿拉伯世界就试图从中东版图上清除这个异己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阿

以之间冲突、危机和战争不断，阿拉伯世界也由起初的强势和优势逐渐转变为弱势和劣势。中东政治格局的这种变迁，不仅是阿以双方之间冲突、战争、妥协甚至和解的结果，也是国际上外部势力尤其是外部大国对阿以双方影响和干预的结果。为获取和维持中东地区的优势地位，外部大国强制己方和对方的代理国不能突破它们的战略底线，损害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

1. 1948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

1948 年的阿以战争见证了中东政治由英国绝对统治演变为美苏介入干预的过程。英国将自己视为埃及、约旦以及伊拉克的保护国，但其当时根本没有实力干预中东问题。在以色列建国前及阿以战争爆发后，英国曾向其阿拉伯代理国提供武器，英军官甚至在约旦军团中服役。1948 年联合国安理会在中东实行武器禁运，作为禁运提案发起国的英国则认为新生的以色列国在阿拉伯国家进攻几周内一定会崩溃。^[3]相比较而言，前苏联领导人认为以色列的胜利会迫使英国脱离该地区，于是决定对以进行军事援助。为避免公开违反安理会决议，前苏联依靠其在东欧的代理国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甚至在联合国向以提供外交支持，为以夺取分治计划边界外的加利利地区的土地提供合法性，认定以对埃拉特湾北部领土拥有控制权。

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处于绝对优势，英国对阿以战争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英国装备下的约旦军队成为以色列的最强劲对手，阿拉伯军队对以形成了包围之势。但在第二次停战协议达成后，与美苏支持下的以色列军队相比，英国支持下的阿盟军队已成为相对落后的一方。在北部战线上，以军击溃了阿军，夺取了西加利利的大片领土。对以色列来说，它虽希望实现更大的军事胜利，但也担心英国可能据 1936 年与埃及、1946 年与约旦分别达成的防御协定而进行直接干预，这可能将以色列拖入与英军直接对抗的境地。

1948 年的战争逐渐演化为拉锯战，双方都面临严重的后勤困难，外部援助十分关键。阿拉伯国家有的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有的未能解决国际禁运难题。在阿军进攻以色列四周后就出现了军队补给不足的问题，被迫接受第一次停火提议。而以色列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从苏联、美国和西欧购买了大批军火，很快改善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

联合国安理会 1948 年 11 月 4 日及 16 日的决议要求以色列返回到战前边界，美国坚决要求阿以结束敌对状态，以军从其夺取的领土上完全撤出，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必须尽快击败埃及军队的决定。12 月，以军突破国际边界，试图包围埃军阵地。12 月 31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以色列此举过火，给以政府致信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以色列若不从埃及领土撤军，美国将重新评估与以的关系以及支持以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以色列害怕丧失美国的支持而在联合国遭外交挫折，被迫接受了停火协议。

冷战开始后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大国干预中东战争时需要顾忌更多因素，导致其对外决策不够坚决。美国虽不反对前苏联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但也不希望英国受到太多牵连，导致英以正面冲突，并最终使前苏联在中东战争中获益。因此，杜鲁门“最后通牒”中的言辞较为模糊，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美国一定会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一旦大国干预的政治意愿减弱，地区国家的自由性就会相应增强。以色列正是综合考虑了英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它们干预中东战争的实力与政治意愿，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性，才最终赢得了战场和战争的主动性。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过度相信外部势力的干预，从而丧失了发展壮大实力，充分利用战场有利形势的机会，由主动变被动，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使以色列反败为胜。

2. 1967 年的“六日”战争

在 1967 年战前冲突升级过程中，前苏联通过各种途径向埃及和叙利亚通报了以色列在叙以边境上已经部署了 13 个师，正计划进攻叙利亚，其用意在于：首先，希望国际社会将以色列视为入

侵者，为对其采取军事行动铺平道路；其次，威慑叙利亚不要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导致其军事失败以及什叶派政权的垮台；再次，希望埃及与叙利亚的军事联合能有助于对以进攻叙形成威慑；最后，试图迫使埃及为支持叙利亚而从也门撤军。总之，前苏联将叙利亚和埃及视为自己的保护国，希望两国成为其与美国争夺中东势力范围的重要战略棋子。

1967年初，前苏联准备干预未来的阿以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苏的支持也充满信心。1967年1月苏在地中海的舰队也加强了戒备。尽管当时尚无法确定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但从5月3~20日，苏将黑海舰队和北方舰队从波罗的海及北冰洋基地派往地中海，至少有一艘核潜艇从巴伦支海被派到了地中海，另一艘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苏核潜艇则接到了如果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使用核武器就向以发动核导弹袭击的命令。6月8日，一个苏空军中队抵达了红海岸边的埃及港口。

尽管如此，前苏联还是终止了任何形式的干预计划。战争初期，苏军方缺乏对战场发展的全面把握，未能给予阿拉伯国家积极援助。6月8日傍晚，埃及拒绝了关于实现停火的任何提议，坚持要求以色列首先从占领领土上撤军。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其他因素导致了苏的无所作为。苏并没有准备在中东冒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且发现美以关系明显升级。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公开其以色列保护国的角色，将第6舰队部署在沿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海岸线上，北约军队也控制了中东战场的空中和海上通道。另外，以色列并没有危及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权稳定，至少未能直接威胁两国的政权稳定，这意味着苏在该地区的利益以及苏埃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威胁。而苏对外决策过程迟缓也妨碍了采取任何及时的军事或外交行动。因此，前苏联警告以色列若不能立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6月4日达成的停火决议，苏以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其中，尽管提到了可能采取“其他必要的步骤”，但措辞含糊，缺乏威胁力度。

美苏在东西方阵营间的争夺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而中东地区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尚不能与欧洲及东亚地区相提并论。另外，中东战略形势的复杂性也未能促使苏联决策者将更大的赌注投到中东战场上。因此，埃及总统纳赛尔逐渐对前苏联的战略干预失去了信心，认为苏美已经达成了相互理解，不愿在中东迎头相碰。约旦军团的指挥官格拉布甚至提出了一种“阴谋”理论，认为前苏联希望看到阿拉伯国家被击溃，因为这样一来，阿拉伯各国就会更加依赖苏联，加深对西方的仇视。^{[4] 74}

在战争初期阶段，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成为它们所宣称的军事胜利的受害者，苏认为没有必要为之提供帮助，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又意味着美不必干预以色列，可使美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威慑前苏联。既沉重打击了苏的尊严，又为阿以谈判提供了新机会。6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战况表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预计美国会非常乐于见到叙利亚失利。^{[5] 36-71} 尽管以色列不可能推进到大马士革以推翻叙利亚政权，但苏不愿冒此风险。在给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未能停止前进，苏联将进行干涉。尽管很难断定苏是否会使用武力，但美官员认为苏联指挥官可能会将军队空运到中东。最终，苏并未采取军事行动兑现自己的威胁承诺，其无所作为帮助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战场上取得了胜利。^[6]

3. 1973年的斋月战争

在1973年战争中，前苏联的军事支持对埃叙的战争准备相当关键：首先，美国不会支持任何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其次，埃叙军队均使用苏制武器装备，在作战安排方面不得不与苏协调。埃及总统萨达特原计划在春季作战，但由于美苏首脑会谈计划在1973年6月举行，苏要求埃叙将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季。

当美国在 1973 年初坚决反对再发生中东战争时，以色列总理梅厄允诺以决不会首先发动进攻。10 月 6 日，当战争日益临近时，以色列一再向美保证以军不会发动先发制人战争。采取这种决定的逻辑可能是逃避战争爆发的责任，以免招致美切断武器供应或限制以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梅厄更希望美国会因以色列的“良好表现”而给予奖赏。

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似乎说明：两国根本不需要前苏联的干预。然而，苏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向埃叙运送大批军火，几乎是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 2 倍。以色列在叙利亚战线上的推进引起了苏的极大关注，苏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警告美国务卿基辛格，如果以色列继续前进，局势将会超出控制范围。在南部战线，埃及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前苏联干预的几率就越高。为防万一，苏动员了战略空军，向埃及部署了两个装备有核弹头的飞毛腿导弹部队，以色列则相应地部署了杰里科系列导弹。

由于双方都认为以色列能够击败埃叙，美苏之间的战略互动相当微妙。苏试图采取一些措施弥补阿拉伯人的损失，甚至希望尽快实现停火以确保埃叙在战争初期所夺取的领土。随着以色列 10 月 11 日进攻戈兰高地后叙利亚军事处境日益恶化，苏加强了外交努力。美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调整战略方案，不仅准备在军火方面援助以色列以制衡苏向埃叙的军事支持，而且未对以突破紫线（即 1967 年后边界）加以制止，并尽力避免与苏在停火方面的合作。

当以军包围并准备击溃大批埃及军队时，前苏联向美国施加压力，力促停火。辛格希望在以色列取得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力求促成延缓停火。在 10 月 20 日离开苏之前，基辛格向以表示尚有额外的 48 小时可完成对埃及第 3 军的包围。在苏前往以的行程中，基辛格了解到以军还需要 2~3 天才能完成既定任务后又再次承诺给予帮助。当苏威胁进行干预时，美又玩起了两面手段，一方面表示埃及可向被围困的第 3 军提供食物和医药，另一方面又宣布全球军事动员，并向以色列保证若苏加入埃及方面进行干预，美将考虑派军。当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时，埃及军队实际上已被击溃。

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看来，唯一愿意向以色列提供军火的国家只有美国，那些建议以色列避免依靠美国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以色列接受失败。尽管以色列放弃首先发动进攻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但美不顾以色列的紧急要求，于 10 月 13 日停止向以运送军火。战争开始后不久，以色列的军事设备损失相当严重，梅厄甚至考虑亲自飞往美国说服美政府立即恢复向以提供军火。学界普遍认为，基辛格也害怕以色列在面临失败局势时，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核武器以挽回败局。^{[5] 165-206}如果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后果将不可收拾。^[7]

4.2006 年的黎以战争

冷战后的中东日益呈现出美国独霸的趋势，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难以制衡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大国干预在中东政治事务中的非对称性更加显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国对阿以冲突双方都实行强制性外交，促使双方为实现中东政治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让步。对以色列而言，维持当前中东安全局势的强势稳定已成为其所宣扬的“和平”基础，任何危及以安全的传统与非传统威胁都被其视为“恐怖主义”而予以清除，在黎南部长长期从事针对以色列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即为清除对象之一。

2006 年 7 月 12 日，黎巴嫩真主党越界抓捕了两名以色列士兵，由此导致黎以之间连续 34 天的冲突。这场冲突直到 8 月 14 日联合国安理会派出的维和部队进驻该地才停止。战争给黎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损失，黎巴嫩的物质损失估计达 36 亿美元。^[8]黎南部部分地区需要大约 10 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以色列虽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但并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且受到了来自国际、国内多方面的指责和非议。

美国迟迟不对此次冲突做出反应，美国务卿赖斯表示：“黎以冲突将是新中东产生前的阵痛”，这引起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不满。在此情况下，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提出了解决黎以冲突的主张和见解，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部分代表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利益，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8月5日，法国和美国就联合国一项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实现“全面停火”的决议草案达成共识。8月9日，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对美国拒绝将黎巴嫩要求纳入安理会决议草案的“保守态度”提出了批评，要求美对其在解决这场冲突中的消极表现“作出解释”。他甚至威胁美国说，如果这项决议草案无法在联合国得到通过，法国将提出一项“属于法国”的新草案。

尽管美法之间联手解决黎以冲突问题，但法国认为，两国合作可谓“矛盾重重”：首先，法国要求“立即停火”，并坚持将实现停火作为派遣维和部队的先决条件。美国则认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让维和部队尽快进驻；其次，法国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派遣维和部队，反对美国提出的派遣北约部队的观点，认为这会被阿拉伯国家视为西方对该地区的军事干涉；最后，法国认为应该让伊朗参与解决这场危机，而美国则坚持将伊朗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然而，法国也难以独立完成解决黎以冲突的历史使命，离开美国的合作，或者说如果美决定不对以色列施加任何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也会使法在解决黎以冲突的过程困难重重。

8月11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美国和法国联合草拟的1701号决议，这个仍被斥为“只不过是胜利者表达非法正义”^[9]的决议授权将在黎南部部署的不足2000名联合国维和士兵增至15000名，并由法国牵头组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与黎政府承诺的15000名政府军士兵在以军撤出的同时部署到黎南部地区，以填补以军撤出后的安全真空。8月12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宣布，黎以双方的停火时间“将从格林尼治时间8月14日5时正式生效”。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军队于贝鲁特时间14日8时整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实行全面停火，从而结束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激烈冲突。^[10]

我们从大国干预阿以战争中可以发现四点：

首先，大国干预对阿以战争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攻守进退，而且体现在战场外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后者甚至决定着前者的过程；其次，大国干预对当事者双方不仅具有积极影响，也存在消极作用。大国干涉成为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11] 59-85}在1956年战争中，以色列与英法战略合作确实取得了一些实际的外交收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可以通过投否决票使安理会难以达成关于中东的决议。但以色列与英法的协定也限制了其使用武器的类型。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不能首先动用军事力量袭击埃及空军。在战争过程中，以色列空军不能袭击苏伊士运河以西的任何目标。由于不能预先确知英法是否会参战，以色列领导人决定在战争初期有节制地使用装甲部队。如果英法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以色列就会将装甲部队仅用于大规模报复行动，即使撤军也不会失去颜面；再次，阿以双方对大国干预的态度呈变化态势。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借助美苏干预停火取得了战场优势，而阿拉伯国家依靠“夕阳帝国”势必落后挨打。在其后的阿以战争中，大国干预往往是在以色列取得军事优势后才开始，实现停火不过是挽回大国的颜面而已，苏偏好表演性行为而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不能挽回阿拉伯国家被击败的命运，甚至巩固了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因此，埃及最后不得已抵制了前苏联的干涉，主动与美以实现单独和解；最后，大国对其代理国安全承诺的连续性成为代理国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与其生存安全是紧密相联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以色列经不起任何大的战略失误，美对以的战略支持也是以维护其生存安全为底线，以实现和平稳定为目标的。

三、结语

从 20 世纪四十年代至今，阿以战争烙上了大国干预的印记。通过对四次中东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大国干预的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安全利益。冷战时期美苏在维护各自集团内部稳定的情况下拓展安全利益，原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之外的中东地区必然成为争夺目标。欧洲冷战以及其他地区热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阿以冲突成为大国拓展安全利益的最佳切入点，也为它们进行干涉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次是威胁认知。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将对方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视为对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扩展影响力的威胁，这种威胁认知的偏执导致双方战略上的针锋相对。在阿以冲突中，也存在威胁认知发生转移的现象。前苏联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实际站在以色列一边，而随着美以关系不断密切，苏联才逐渐将以视为自己在中东拓展安全利益的障碍；最后是文化认同。大国利益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也较为复杂。法国与黎巴嫩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贝鲁特甚至被称为“东方巴黎”，法国对黎巴嫩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而美国与以色列多年的战略合作也加深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因此，各自促进与自身文化认同相近国家的安全利益成为必然。^[12] 鉴于美法传统盟友关系，二者不可能为相互支持的对象而发生正面冲突。况且法国并没有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对手而予以打击，因此 2006 年黎以冲突的解决方式也顺理成章。

阿以战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巴以冲突上，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只能对巴勒斯坦提供一定物质和精神的“人道主义”援助。自 1973 年以来，几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头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军事冲突了。像真主党这样的武装组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支持，在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中难以形成实际威慑。大国对阿以战争的干预也更多地体现在约束以色列的安全过敏和军事行动、抑制阿拉伯国家对以军事挑衅以维持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

[参考文献]

- [1] Benjamin Miller. When Opponents Cooperate: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Ian J. Bickerton and Carla L. Klausner.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5; Janice Gross Stein. The Managed and the Managers: Crisis Pre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 Gilbert R. Winham. New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M].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8; Paul Marantz and Blema S. Steinberg. Superpower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M].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Moshe Efrat and Jacob Bercovitch.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balance of Influ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vi Kober. Great-Power Involvement and Israeli Battlefield Success in the Arab-Israeli Wars, 1948-1982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6, 8 (1).
- [2]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1948 Arab-Israeli War [EB/OL]. [2007-05-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48_Arab-Israeli_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 [4] Samir A. Mutawi. Jordan in the 1967 Wa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William B.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7-1976[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6]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ul Jabber and Roman Kolkowicz. *The Arab-Israeli Wars of 1967 and 1973*[C]// Stephen S. Kaplan.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Fawaz A. Gerges,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5-1967*[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Galia Gol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June 1967 Six-Day War*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6, 8 (1).
- [7] Paul Jabber and Roman Kolkowicz. *The Arab-Israeli Wars of 1967 and 1973*[C]. Stephen S. Kaplan.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Ray Maghroori and Stephen M. Gorman. *The Yom Kippur War: A Case Study in Crisis Decision-Ma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and Michael Joseph, 1982; Christopher C. Shoemaker and John Spanier. *Patron-Client State Relationship: Multilateral Crises in the Nuclear Age* [M]. New York: Praeger, 1984.
- [8] 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EB/OL]. [2007-05-27].
<http://www.un.org/Depts/dpko/missions/unifil/background.html>.
- [9] Stephen Lendman. *The Sham Called UN Resolution 1701*. [EB/OL]. [2006-08-16].
http://www.populistamerica.com/the_sham_called_un_resolution_1701.
- [10] Jeremy M. Sharp. *Lebanon: The Israel-Hamas-Hezbollah Conflict* [R]. [2006-09-15]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September 15, 2006. 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66.pdf.
- [11] Avi Kober. *Coalition Defection: The Dissolution of Arab Anti-Israel Coalitions in War and Peace* [M]. Westport: Praeger, 2002.
- [1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reat Power's Intervention in Arab-Israeli War

ZHOU Shixin

Abstract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regional affairs is embodied in the horizont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powers as well as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s and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lance, asymmetry and coercion of power intervention indicate that it is a complicated dynamic proces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profoundly runs through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illustrating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six wars between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is paper finds the elements of security interest, threat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fluencing the dynamics of the power interventi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rom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Arab-Israeli wars have manifested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the defeats of Arab countries during the wars. The effects of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still exists nowadays, it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 significance to the Arab-Israeli peace and Middle East security.

Key Words Arab-Israeli War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Coercion; Security Interests; Threat Perception

(责任编辑：李 意)